

世界冷观察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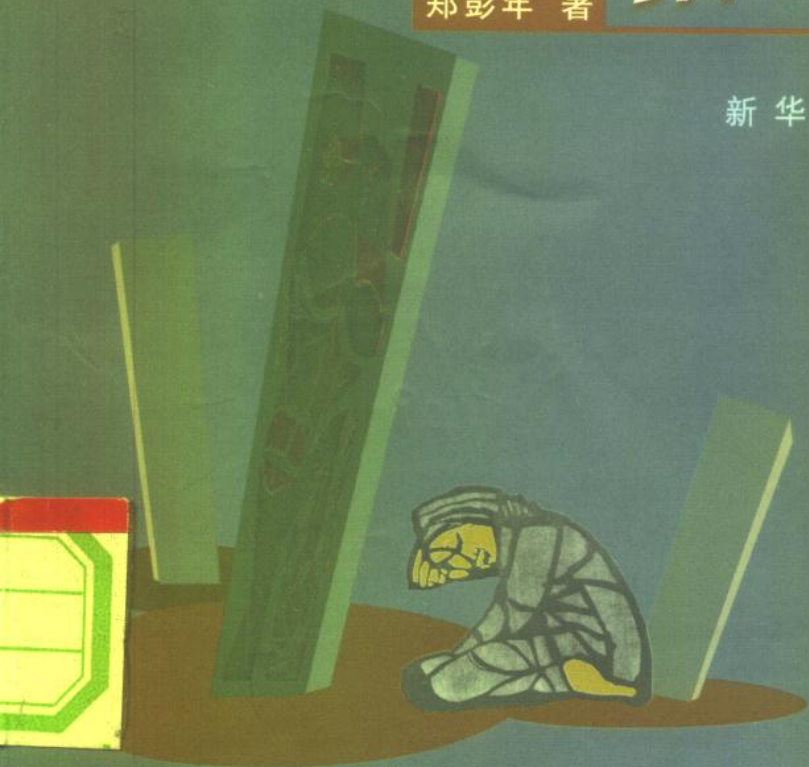
靖国神社

—日本军国主义的

招魂幡

郑彭年 著

新华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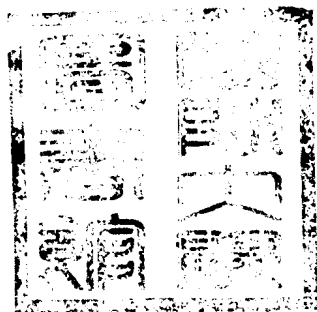


国防大学 2 070 3549 3

靖 国 神 社

——日本军国主义的招魂幡

郑彭年 著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靖国神社——日本军国主义的招魂幡/郑彭年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0.1

ISBN 7-5011-4670-5

I. 靖… II. 郑… III. 靖国神社-研究 IV. K89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52346 号

靖 国 神 社

——日本军国主义的招魂幡

郑彭年 著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875 印张 195 千字

2000 年 1 月第一版 2000 年 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4670-5/D·740 定价: 20.00 元

序 言

有时候,反面教材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它常常在昏瞶中使人们觉醒。日本的靖国神社就是一个实例。

靖国神社之所以为人们所久闻,并非因为它的建筑物有多么奇特,实在是因为它具有以下几种性质:第一,它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把坏人当作好人,甚至作为“神”来敬拜;第二,它篡改乃至否定历史,不承认近代以来日本发动历次侵略战争的罪责,为今后日本侵略势力再兴埋下伏线;第三,它抹杀真理,把战争当作和平,把侵略当作解放,完全丧失人性和理智;第四,它宣扬极端民族至上主义,为本民族的利益可以不顾乃至牺牲他民族的利益,甚至奴役别国人民;第五,它提倡武士道精神,重温旧梦,妄图重新称霸;第六,它制造假神,崇拜偶像,造成宗教上的混乱。

中国是受日本侵略之害最深的国家,对于靖

国神社应当彻底加以批判和否定。这对推动当今世界的和平和发展,对世界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特别是对我国青少年一代认识历史和认识社会,都是很必要的。因此我撰成本书,希冀借此对近来日本追随美国的所作所为引起警惕,决不允许历史重演。

本书首先从日本武士道着手,剖析了靖国神社的创建和发展的历史背景。其次以游记的笔法介绍了靖国神社的实际情况;为防止其毒感染,边介绍边批判,将其真面目暴露于世。最后将靖国神社 37 个幽灵予以揭晓,从而揭示了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反动本质。

此外,本书还扼要介绍了被日本人民称作神的几位进步人士的生平事迹,并与上载诸人一起,被在“神社”立了牌位。今谨做附录附于书后,作为另辑,以别于武士道诸人,借以加深读者对靖国神社的认识。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承蒙朱伟时、高融昆、叶瑜荪、彭寿、郑汉中、张奇英诸先生帮助和鼓励,谨在此致谢。

郑彭年谨识于浙江桐乡

1999 年 7 月

目 录

序 言	1
导论：日本武士道的真面目	1
靖国神社的曝光	15
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和看法	15
沿革、位置、交通和开馆时间	18
建筑群与祭典	21
神社一日游	23
靖国神社的幽灵	36
源义经：切腹自杀	36
武藏坊辨庆：乱箭射死	44
楠木正成：互刺自杀	49
新田义贞：割头自杀	56
织田信长：切腹自焚	61
明智光秀：割头自杀	66
千利休：切腹自杀	72
石川五右卫门：油煎死	80
石田三成：斩首	82
浅野长矩：切腹自杀	88
大盐平八郎：自焚	97
渡边华山：切腹自杀	103
藤田东湖：地震压死	109
月 照：投海自杀	113
吉田松阴：斩首	118
梅田云滨：狱死	125

桥本左内:斩首	129
井伊直弼:刺死	133
武市瑞山:切腹自杀	138
坂本龙马:刺死	143
川路圣謨:手枪自杀	151
横井小楠:刺死	155
大村益次郎:刺死	159
江藤新平:枭首	162
西乡隆盛:砍头首杀	167
大久保利通:刺死	172
乃木希典:切腹殉死	176
广濑武夫:战死	182
伊藤博文:枪毙	188
山本五十六:战死	199
近卫文磨:服毒自杀	204
山下奉文:绞死	212
东条英机:绞死	221
广田弘毅:绞死	231
三岛由纪夫:切腹自杀	237
靖国神社大事记	243

附录 为大多数人利益而死的人士

小林多喜二:打死	251
幸德秋水:绞死	261
市川正一:狱死	273
大杉荣:扼死	281
渡边政之辅:手枪自杀	291
山本宣治:刺死	298

导论：日本武士道的真面目

相对说来，日本人是个不怕死的民族。自古以来，日本人对生死观念比较淡薄。为某事，有些人往往轻生或者“视死如归”。他们不仅可以为民族、国家、天皇、主君或少数上级的狭隘利益即下对上的所谓“大义大节”而死；还可以为亲戚朋友、父母兄弟的所谓“小义小节”和“孝道”而死；甚至为自己的失败、耻辱和欲望的不满足而切腹自杀，终于使切腹成为表达意志和维护“荣誉”的一种仪式。

日本人的这种生死观是有其传统即历史渊源的，确切地说它是武士道精神的产物。何谓武士道？武士道就是武士这个特定阶级的道德规范，它是随着武士阶级的产生而逐渐形成的。

12世纪末，出现了以源赖朝(1147—1199)为首的关东武士集团，结束了以天皇为首的古代王朝政治，开创了以幕府为中心的中世武家政治。镰仓幕府(1192—1333)的成立标志着日本正式进入中世封建社会。随着庄园的发展，领主为了保卫和扩大自己的领地而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力量。寺院为了保卫自己的利益也组织“僧兵”之类的武力团体。国司和郡司(地方官)为了地方治安更需要加强自己的武装。这样，一部分庄民被武装起来，成为脱离农业生产的武士，从而产生了武士阶级。

武士有佩刀的特权(一般百姓不许带刀)，可以就地杀死对武士有无礼行为或对其上司不表敬意之庶民。武士在法律上禁止成为生产者，从农民交纳的年贡(租米)中取得俸禄，成为寄生阶级。封建领主(诸侯或大名)向农民收取年贡，然后由封建领主作为俸

禄分配给每一个家臣——武士。武士的生活完全依赖领主，成为领取一份固定俸禄为生的人。因此，领主与武士之间在经济上建立起牢固的依附关系，从而在人身上武士隶属于领主，必须为领主奉公，即无条件服务。为了巩固武家的统治，1232年（四条天皇贞永元年）制定了代表武士阶级利益和思想意识的第一部武家法典《贞永式目》（即《御成败式目》）。这部法典和古代的大宝律令不同，以武士的道德伦理为规范，以封建领主和家臣的相互关系为准则而制定的。它明确规定了守护、地头等家臣的身份和任务，各级武士都要严守岗位，绝对忠于自己的主人，树立了封建秩序和等级制度，提倡了儒家的“三纲五常”^①，以达到臣忠君、子孝父、妻从夫。显然这部武家法是以中国的儒学为其主要内容，是在禅宗直接影响下产生的，因为当初儒学即朱子学是依附禅宗而传到日本的。

当时日本已从古代国家演变成封建社会，意识形态上和禅宗思想一致，所以禅一传到日本就受到举国上下的欢迎，执权北条时赖（在职1246—1256）慨叹旧佛教天台真言宗的堕落，不能摆脱旧势力的束缚。他为了要获得宗教上的实权，1252年（建长四年）在镰仓建立建长寺，聘请中国禅师兰溪道隆来做开山，与京畿地方的旧寺院相对峙。由于禅宗的朴质节欲、一心修道的宗旨与崇尚勤俭朴素的镰仓武士的旨趣相符合，而且禅宗的威严礼仪也为重礼节、尚志气的武士所钦慕。加之，大休正念（1269年来日）、无学祖元（1278年来日）、一山一宁（1281年来日）、西硯士昙（1299年来日）等中国禅师相继来到日本，禅宗很快就兴盛起来。自从1262年北条时赖彻底大悟之后，镰仓武士便与禅宗结下不解之缘。后来大休正念接受了执权北条时宗（在职1268—1284）的皈依。特别连天皇也皈依禅宗，如后白河、后鸟羽、后嵯峨、后深草、龟山、伏见、后伏见和花园等天皇都削发为僧，成为佛门弟子，称为法皇。

禅宗强调主观能动性——即心是佛，主张简单朴素，抛弃一切繁琐的理论和仪式，通过沉思静坐（坐禅）和大自然混为一体。在坐

禅中严格进行自我约束,锻炼自我克制的精神和坚强不屈的性格,使心如木石,即所谓“兀兀如愚”、“如聋如哑”,要人内无一物,外无所求。这种灭却人性的克己主义精神正适合武士的职业、生活方式和心理状态。同时禅宗的修行目的主要是打破生死之牢关,临危不惧,遇大难也能从容行事,决不动摇信心。无学祖元说:“若能空一念,一切皆无恼,一切皆无怖,犹如着重甲入诸魔贼阵,魔贼虽众多,不被魔贼害,挥臂魔贼中,魔贼皆降伏。”^②1281年(弘安四年)日本被蒙古军打败以后,北条时宗很烦恼,无学祖元写了“莫烦恼”三字赠给他。时宗还用血写了《金刚经》和《圆觉经》,十足表现了武士道精神。当蒙古大军入侵、日本面临灭顶灾祸时,日本武士尚能从容不迫地息此大难,可以说是修禅之功吧。

日本的禅宗与中国不同,兴禅的目的是“护国家利众生”,带有浓厚的忠君爱国思想,也就是要实现儒家的“忠恕”、“仁民”,要求忠于自己的主君,爱自己的国家。圆尔辨圆在他的《圣一国师语录·呈藤丞相(藤原兼经)》中说:“五叶花开无根树,一阵香风天地宽。天地宽兮春万国,家门盛兮民物安。”^③禅法兴隆后则带来天地广大,国泰民安,把禅法与政治紧紧连结起来。1282年(弘安五年)12月18日,南宋僧无学祖元在圆觉寺大光明殿庆赞会上拈香时说:“此一瓣香根萌于忠孝之地,枝生于般若之林,热向炉中,恭祝延今上皇帝圣寿无疆。”^④祖元还把参禅悟道与“事母尽孝、事君尽忠”的儒家的忠孝思想联系起来,给武士道的形成以极大影响。

1257年元军南下时,祖元在温州能仁寺堂中坐禅。士兵将刀架在祖元的脖子上,他毫不动色,念一偈:“乾坤无地卓孤筇,喜得人空法亦空。珍重大元三尺剑,电光影里斩春风。”^⑤这种打破生死牢关的修养工夫也是日本武士所要效法的。以厮杀为其职业的武士要使自己的意志锻炼得像墙壁那样坚定不移,坐禅是一种好方法。所以当时武士纷纷参禅,把它当作锻炼自己意志的一种手段。他们认为,人可以通过特殊修行使其精神变成至高无上、压倒一切

的东西，作出奇迹来。

如前所述，日本的武士道把中国的儒学特别朱子学（宋理学）作为自己的主要内容，从而尊王勤王思想在武士头脑中扎根。禅师慧安说：“今在王地，树下石上，革衣木食，滴水寸土，无非朝恩。行道修善，皆归国家。知恩报恩。”^⑥这里说一切都是朝廷恩赐的，作为一个臣民要知恩报恩，要求对主君尽忠。在这种尊王思想的支配下，楠木正成（1294—1336）高举勤王大旗，辅佐后醍醐天皇进行倒幕，实行“王政复古”（回复到昔日的天皇统治）。但楠木正成于1336年5月29日湊川会战被足利尊氏打败，最后尽忠自杀，留下了后世所谓的“七生报国”的信念。敌人足利尊氏也被楠木之死感动，将其首级送交河内水分的楠木遗族。后来楠木的“忠君爱国”思想被水户学派大加渲染，成为武士道精神的典范，对后世影响巨大。

武士道中的主从观念非常强，为主人而死是天经地义的事。源赖义（988—1075）的部下经常讲这样的效忠话：“人万死而不顾一生，悉为将军弃命。”“若惜生命不致死力，必当神镬而先死。”“今为将军弃命，轻如鸿毛；宁可向贼而死，不得背敌而生。”“君以礼遇臣，臣以忠为君尽心。在军阵救君之危，在太平之时不计赏禄，侍奉无二。”

当时殉死的风气很盛，主君身亡，臣子要殉死。没有臣殉死的君不足为君，作为臣不殉死则不足为臣。殉死以多为夸。这种风气一直影响到后代，流毒极深。如1636年（宽永十二年）仙台藩主伊达政宗（1567—1636）死时，殉死的家臣有15人；同时为这些殉死者而殉死的还有5人，共达20人之多。这些殉死者都葬在仙台瑞凤殿的伊达政宗的墓边。又如1912年明治天皇死时，乃木希典大将为表示对天皇绝对忠诚及清算过去两次战争中失败的耻辱，与妻子一起切腹殉死。更甚的是至1989年昭和天皇病死时，竟然还有两名旧军人殉死。^⑦

1333年(元弘二年)即楠木正成自杀的三年前,由后醍醐天皇领导的倒幕运动高涨。同年5月7日,后醍醐天皇命足利尊氏围攻京都,六波罗^⑥方面分兵3000各处把守,但终因众寡不敌,六波罗北厅的北条仲时(1306—1333)和南厅的时益带了光严天皇、后伏见和花园上皇突围逃出京都。在近江的番场,北条仲时遭到五鹯宫和当地武士的袭击,时益中箭身亡,光严天皇左腿中箭负伤。仲时自知大势已去,切腹自杀。家臣糟屋宗秋也随即使用仲时切腹的刀自决,部下跟着切腹。《太平记》生动地描述了这一集体切腹的场面:“共432人同时切腹,血浸其身,恰如黄河之流。尸体充满庭园,与屠场之肉无异。”^⑦这种骇人听闻的集体切腹自杀事件是史无前例的,充分说明了武士道精神的残忍性和封建领主与家臣(武士)间的主从关系的牢固性,为其后武士道思想的理论化体系化在实践上提供了可能性。

武士道是根据儒学而树立起其思想体系的,其思想要素是忠诚、牺牲、信义、廉耻、礼仪、洁白、朴素、俭约、寡欲、尚武、名誉、爱情等,这些都是儒家的道德项目。早期武士道还没有形成一个思想体系,只有所谓“兵之道”、“武者之习”,重视武艺,特别“尊名知耻”、“不言实行”。至德川时代(江户时代,1603—1867),确切地说至德川中期(1680—1716),随着儒学成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武士道也就成了封建统治思想的一大支柱。同时由于中江藤树(1608—1648)、山鹿素行(1622—1685)、贝原益轩(1630—1714)、大道寺友山(1639—1730)和山本常朝(1659—1721)等儒家辈出,使武士道理论化体系化。

武士道理论的始祖山鹿素行推崇中国儒学的“圣学”、鼓吹“忠恕”、“仁义”。他说:“忠者为人谋而不私于身也,信者恣实而不欺也……忠以事君长,信以交朋友。”^⑧他还说:“孔孟之教人曰‘守死善道’,曰‘杀身成仁’。夫死生者,人之大事也。至道义之当守,生不足恋,死不足顾。”^⑨

山鹿素行的弟子、兵法家大道寺友山进一步使武士道日本化，著有《武道初心集》，它与山本常朝的《叶隐》合称为武士道书的“双壁”。大道寺友山说，“要做一个武士的话，首先从大年初一吃早点到除夕夜晚都要考虑到死”^⑫，把死当作武士的最首要任务。山本常朝在他的《叶隐》中给武士道下了一个定义：“所谓武士道就是把死当作家常便饭。”^⑬

大道寺友山在他的《武道初心集》中还给作为一个典型武士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武士临战场，决不当顾家室。出阵应有战死之决心，以生命付诸一掷，方得名誉。与敌骑决胜负而被敌取首级时，敌为正色问我姓名，即应朗报己名，莞尔授领，不可有懊丧畏缩之态。负致命伤时，若尚有气力，必向番头（相当连长）、组头（相当排长）、同伙（战友）报告，不露痛苦，处以冷静无事之色，方不失为武士第一意义。”^⑭

1703年1月30日发生了以大石良雄为首的47名“赤穗义士”为主复仇后被处以集体切腹事件，时人为之轰动。大儒室鸠巢（1658—1734）著《赤穗义人录》2卷，对“义士”的忠义行为大唱挽歌：“慨忠善之不祚，恨天道之无知。”并肯定他们为“舍生取义”、“重君臣之义”。^⑮林信笃大学头称赞道：“及彼一举，奋发兴起。以向义之心起，君知信臣，臣知忠君也。”^⑯“赤穗义士”的这种“全死节”的精神被当时的统治阶级发扬光大，200多年来一直成为武士道精神的典范，被后来的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利用为欺骗人民进行统治和发动侵略战争、驱使人民走上战场为天皇卖命的思想武器。

朱子学的“大义名分论”也是武士道的重要内容之一。所谓大义名分就是臣对君、子对父应守的节义和本分。朱熹写了《资治通鉴纲目》59卷，从大义名分论的观点将中国历朝分正统与非正统、华夏与夷狄、王道与霸道之别。在朱熹的影响下，德川光圀（1628—1700）也以大义名分论为主导思想编纂了《大日本史》397卷，肯定

了幕府的统治。《大日本史》的名分论成了将军统制大名(诸侯)、直属家臣及大名统制家臣的理论根据。然而至幕末,西方殖民主义势力东侵,日本面临沦为殖民地的危机,广大爱国民众对腐败的德川幕府感到不满,于是产生了主张“尊王攘夷”的后期水户学派。其代表人物藤田幽谷(1774—1826)说:“一君二民,天地之大道也。虽四海之大,万国之多,而至尊不宜有二。”^①他基于名分论即王道思想来鼓吹尊王攘夷论。后来以名分论非难幕府统治的倾向逐渐增长,武士道的楷模、勤王家楠木正成被幕末志士抬出来顶礼膜拜,武士道精神也成为革命志士向反动腐败的幕府作斗争的原动力,起了进步的作用。吉田松阴就是写下著名的遗诗“肉躯纵曝武藏野,白骨犹唱大和魂”之后从容就义的。土佐藩勤王党领袖武市瑞山在狱中题诗道:“花依清香爱,人以仁义荣。幽囚何可耻,只有赤心明。”最后,他以无上光荣的心情接受武士的最高荣誉处分——切腹,按古代的“三”字切腹法自杀,为“尊王倒幕”事业作出了牺牲。

1868年明治维新成功,幕府的封建统治被推翻之后,武士作为一个阶级已经不复存在,其经济基础明治政府也以赎买的方式(发行金禄公债一次性付给武士)消灭。但是,由于明治维新是一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在思想领域内旧的儒家思想特别是武士道精神没有得到清算。不仅如此,明治天皇的老师元田永孚^②和西村茂树(1828—1902)等还配合社会上的复古思潮,竭力宣扬“儒教复活论”。元田在他拟定的《幼儿纲要》中规定了“孝行、忠节、和顺、友爱、信义、礼让、贞操、刚勇”等20个道德项目,向学生灌输儒学思想。明治天皇还发布《教育敕语》,把儒学作为国民教育的主要内容。于是小学教科书上把楠木正成和源义经等当作忠君爱国的英雄,要大家向他们学习,培养学生的狭隘的爱国主义和忠君思想,让武士道精神复活。1882年(明治十五年)明治天皇又发布了《军人敕谕》对陆海军军人明确指出应有的生死观,即“军人应以尽忠节为本分”,“要意识到义比山岳还重,死比鸿毛还轻”。与此同时,

竭力美化神化天皇：天皇自天上降临地面，“行天下人民之皇政”，而这种皇政是“唯神之皇政”。还强调日本是“万世一系”的皇国，天皇乃“世界之总王”，日本乃是“万国之总帝国”。^①

至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日本资本主义已经形成，为了争夺海外市场和殖民地，日本发动了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在这二次侵略战争中，武士道精神确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赢得了胜利，还出现了陆海两个“军神”——桔周太^②和广濑武夫。他们的“忠魂奕奕永报皇恩”和“七生人间报国恩”的精神被当时的宣传机器大肆宣扬，助长了军国主义气焰，起到了极其恶劣的作用。樱井忠温写了两本日俄战争的实录《肉弹》和《枪后》，他在《肉弹》中说“身体消为旅顺鬼，灵魂不忘七生忠”，宣扬了武士道精神。据说明治天皇和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美国总统赛奥德·罗斯福读了《肉弹》大为感动。^③

1931 年至 1945 年的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期间是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猖獗和古代武士道精神进一步得到弘扬的时代。日本的军政头目曾一再强调，“这场战争（太平洋战争）不是军备与军备的较量，而是美国人对物质的信仰同日本人对精神的信仰之间的决斗。”^④因此日本帝国主义在国内宣扬“死的哲学”和推行“臣民教育”，驱使人民走上战场；在国外则大肆屠杀中国、朝鲜和东南亚人民。1932 年日本发动“一·二八”事变（第一次上海事变），日军侵占上海遭到蔡廷锴率领的十九路军和中国人民坚决抵抗而失败时，国内掀起一股军国热。同年 2 月 22 日，在日军发动的第一次总攻击的庙行镇战役中，混成第二十四旅团所属工兵第十八大队的江下武二、北川丞、作江伊之助三名士兵抱着爆破筒冲入中国军阵地炸死。消息传到日本，给原来的军国热加温，开动一切宣传机器称颂他们的“壮烈牺牲”，把他们叫做“肉弹三勇士”。与此同时，空闲升少佐（大队长）在江湾镇被俘带到南京，3 月 16 日送还给上海的日军。空闲升认为此乃奇耻大辱，28 日到江湾战场旧址用手枪

自杀。荒木陆相立即发表谈话：“帝国军人赴战场，或是胜利或是死，空闲少佐发挥了最高的军人精神，选择了死的道路。这与光荣战死一样，应当与战死者同样处理。”^②于是有七家制片厂以此为题材拍摄电影。4月10日和11日两天全国至少有四个人自杀，以死来鼓励出征。^③

随着侵华战争的不断扩大和日本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日本的法西斯势力更加猖獗起来。军部是法西斯势力的中心，他们企图以武力手段在国内实现军部的独裁统治，在国外发动侵略战争。当时军部以不同的财阀为背景分裂为“皇道派”和“统制派”。皇道派主张取消政党政治，赤裸裸地实行军事独裁统治，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他们对执政的统制派的“缓进”政策感到不满，实行一系列法西斯政变和暗杀活动。他们先后暗杀了滨口雄幸首相、犬养毅首相、井上准之助藏相和三井财阀首脑团琢磨等政界财界要人，并进一步于1936年2月26日发动“二·二六”法西斯暴乱，杀死了斋藤实内大臣、高桥是清藏相和渡边淀太郎教育总监，实行所谓“昭和维新”，企图一举排除执政的统制派，控制政府。当暴乱失败时，参加暴乱的全体军官在陆相府集合，准备好18口棺材、手枪和军刀打算自杀。在他们被处死刑以前，都留下了“吞万斛之恨”的遗言。还有人作诗道：“尊王讨奸孽雪起，成败生死岂足论。狱窗仅见云去来，尚留忠魂护国家。”继承了古代武士的遗风。

1941年1月8日，东条陆相向陆军发布《战阵训》，露骨地强制军人去死。其中如“命令一下要欣然投入死地”；“要超越生死，向一心完成任务迈进”；“以从容就悠久之大义为乐”；“生不受虏囚之辱，死不留罪祸之污名”等等。当时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所员、国学院大学教授大串兔代夫（1903—1967）在他的著作《〈臣民之道〉精讲、〈战阵训〉精讲》的序中说：“我们臣民的生命是贡献给天皇陛下的……国家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我们为皇国的兴隆不惜献出一命。倒在战场上的士兵要欢呼‘天皇陛下万岁’而死去，这是最简洁

而且最完全地表白和实践臣民之道。”^⑧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是国家、天皇和个人合为一体的一元化国家观，以及绝对服从天皇、把欣然为天皇而死当作最高荣誉的古代武士道精神。在这种观念和精神指导下，产生了轻视士兵生命的无谋的战略战术和强行要求自杀，成为战争中大量死亡的原因。

1943年5月阿图岛（美国阿拉斯加前哨基地阿留申群岛之一）被美国夺回时，以山崎保代为首的2600多名日军全部战死。他们在作最后一次突击之前，伤病员全部自杀。阿图岛战役被日本树立为“玉碎”^⑨的偶像，受到法西斯军人的崇拜。阿图岛被美军夺回后，日军在太平洋上节节败退。后来日本在太平洋上的孤岛被美军逐个占领时，日本守军学习阿图岛的“玉碎”精神，死不投降，战至最后一兵一卒，指挥官自杀。如守卫塞班岛的南云忠一中将和斋藤义次师团长、硫黄岛的栗林忠道中将、冲绳岛的牛岛满中将和长勇参谋长等军国主义者都切腹自杀。他们的遗体被秘密埋葬或用汽油烧掉，以免落入敌人之手。军国主义者战败后非但自己自杀，还让老百姓去自杀，不许做美国人的俘虏，如塞班岛战役中有数千平民被迫跳崖自杀。1945年8月15日中午天皇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下午联合舰队参谋长、第五航空舰队司令宇垣缠为天皇效忠到底并不蒙受投降的耻辱而下令出动11架飞机袭击冲绳，作最后一次特攻。因为宇垣缠深信“死中有生，生中无生”。

军国主义者把武士道精神作为战胜敌人的武器，提出这样的口号：敌人的数量要以我们的训练来抵挡，敌人的钢铁要用我们的肉弹来碰撞。因此，在硫黄岛战役中竟采取了这样的非人道手段：为了炸毁美军的坦克，有的日本兵竟裂开战友尸体的肚子，取出五脏，并解开自己的军服，将战友的五脏放在自己身上，仰天躺在路上装死，等待美军的坦克。美军的坦克误认为是尸体，便在身边通过，此时，日本兵便跃起投雷，破坏坦克。

在太平洋战争中把古代武士道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的是神风